

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三次对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有三次谈话影响深远，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这三次对谈所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与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关联，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长治久安。

毛泽东和郭沫若的“甲申对”

1944年，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通过总结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警示人民“切勿重蹈李自成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该文扭转了以往史籍对农民起义的诬蔑，指出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明王朝的灭亡是执政者自身腐败、失去民心所致。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形势已趋明朗。中国共产党决定借纪念李自成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之际，在文化战线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反击。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完成《甲申三百年祭》，3月

19日至22日，《新华副刊》连续4天刊载该文。

国民党对郭沫若展开公开批评和打击，指责该文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而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褒扬方式。毛泽东将该文列入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党发出联合通知，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

毛泽东向全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旨在告诫同志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

“窑洞对”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并试图在国家治理中找到一条新的民主之路。1945年6月1日，黄炎培等7名民主爱国人士联名发出电报，向延

安的中共领导人表达对当前局势的担忧。6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热烈欢迎黄炎培等前往延安。7月4日，毛泽东特邀黄炎培到杨家岭窑洞做客，黄炎培提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黄炎培对于如何打破“民族兴亡周期率”的思考最早可追溯至1942年6月。毛泽东在“窑洞对”中说的话，并非随口而谈。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这一理念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就在边区搞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选举，并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

黄炎培认为，创业者起

初励精图治，但环境改变后，逐渐追求享乐，精神上变得懈怠；先辈们辛苦打拼，后代却满足于现状，惰性发作，最终演变成难以扭转的风气；改朝换代后，新统治者盲目扩张，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难以实施有效管理。毛泽东提出的观点蕴含了人民、民主、监督三个核心要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人民治国；民主治国体现人民意志，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权力滥用。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赶考对”

“赶考对”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深刻忧思和远见卓识。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提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月23日，毛泽东和中

央书记处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赶考对”可以看作是对“甲申对”的一种时空回应。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底气源于在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革命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成功破解“赶考”的命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和准备。

在全国执政后，毛泽东更是以“进京赶考”的态度和“决不当李自成”的决心，将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注入新中国的政权体系当中，并以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等形式纯洁党员干部队伍。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认识，随着中国革命进程向前推进不断深化，体现了对同一问题在持续探索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 武春霞

文史杂谈 | 王安石退休后干啥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罢相回到江宁(今南京)之后，就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之间一个名叫白塘的原本极荒芜的地段，购置了一块地皮，修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稍稍做成了一个家园模样，作为他的府第。府第的周围别无人家，房屋也仅避风雨，并不宏伟壮观，甚至连垣墙也没有修筑，看起来像是设在路旁的小旅店。因为它距江宁城东门和钟山主峰各为七里，王安石就为它取名为“半山园”。

王安石经常出游于江宁附近各地，有时骑马，有时骑驴。马是宋神宗赠送的，驴是自己买的，他还雇用了一名牵卒。后来马死掉了，便专骑小驴。有人曾向他建议说，老年人出游最好乘用肩輿(轿子)，他不肯这样做，并且回答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

苏辙曾在一道奏章中说王安石是一个“山野之人”，大概就是因为王安石的衣着装束和举止行动都不像当时一般士大夫们那样斯文、雅致和奢华之故。

而他的这种本色，直到做了许多年的宰相之后，也不曾有任何改变。

钟山有一座佛寺，名叫定林寺，因距离半山园较近，凡是不到别处旅游的日子，王安石就到定林寺去。那里有专供他居住的一所房子，王安石经常在这所房子里读书、著述，或者接待来访的客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米芾就是在这里与王安石相识的，他为这所房子取名为昭文斋，并当场题写斋名。

对于一向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并因此而被贬谪到黄州的苏轼，当他北徙汝州，路过江宁时，王安石竟把他当作知心朋友加以接待。这时候的王安石，对苏轼只谈论一些与“诵诗、说佛”有关的话题，对另外一些到半山园或定林寺来访的人，也大都是谈论一些同样的话题，基本上是不大议论时事的。

然而像王安石这样曾勇于担当变法重任的人，是不可能对现实政治、国家命运漠不关心的。只有对思想上、政治上真正志同道合的人，他才乐于与之谈论这样的问题。 周军

榆林、榆中、榆关……为什么这么多地名都带“榆”字？

在中国，不少地名带“榆”字，如榆林、榆中、榆关等，这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与自然原因。

这些带“榆”的地名多位于古代北方险关要地，如榆中县隶属甘肃兰州，榆林市地处陕西最北，榆树市位于吉林与黑龙江交界。这些地区气候恶劣、土壤贫瘠，边关城镇无遮无挡，抵御外敌困难。而榆树抗寒抗旱、适应性强，成为改善生态的理想树种。

《汉书》记载，秦朝名将蒙恬击败匈奴后，在河流与城池间种榆树为塞，使匈奴不敢轻易靠近。汉武帝时，卫青退匈奴后在上郡(今榆林)附近“按榆谷要塞”，加强

边关防御。此后，广植榆树成为我国古代边塞建设的一大特色，山海关在明朝前也叫榆关。

榆树不仅在军事防御中发挥作用，其经济价值也不容小觑。榆树树干宽大，木质坚硬，适合制造武器、农具与车辆。晚唐的窦义通过种榆发家，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也称赞榆树繁衍生长能力强，砍后复生，一劳永逸，且榆木利润丰厚。

此外，榆树还是“美食”。春食榆钱的习俗由来已久，东汉崔寔的《四月民令》中就有用榆钱做酱做酒的方法，明清时榆钱佳肴种类繁多，如今榆钱也被应用

到更多新品中。榆树皮富含淀粉和胶黏物质，饥荒年间是百姓的救命树种。

在医疗方面，榆树也有药用价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榆树嫩叶可消水肿、利小便，榆皮能防治皮肤溃烂，还有安眠功效，榆树果实则能利尿、解淋、健脾等。

榆树与边塞文化紧密相连，成为边塞文化的主体之一。它不仅为边关将士提供生存便利，其意象也为边塞增添了诗意。唐代诗人许浑的作品中，榆树都寄托了游子的思乡之情和将士的壮志豪情。在漫长的历史中，榆树以坚韧不拔之姿，守护着边关，见证着岁月变迁。 小山

西天取经为何要一步步走

有一个大疑惑，既然目的就是取经，孙悟空那么能飞，而且自带导航熟门熟路，一个筋斗飞过去，把经书拎回来交给师父不就得了吗？悟空快递，使命必达，何必费那么大劲呢？看到第九十八回，作者才做出了回答，飞在天上、走“云路”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人之为人的问题是，他必须走“本路”，他无

法直接抵达终极；人总是要死的，但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人是在向死而去的一天一天里，在“本路”、在地上的路获得他活着的意义的。所以，“云路”上取的经不是真经，在大地上用双脚一步步走过去，在人世的苦、人生的难中走过去，这才是道成肉身，才算得了真经。

李敬泽